



Taosi Cultur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龙现中国

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

宋建忠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龙现中国

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

Taosi Culture

Root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宋建忠 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致 谢

在本书的编纂过程中,国内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科研院所等单位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文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书中转用的一些图片,限于客观条件无法同所有作者取得联系,未能及时支付报酬,在此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有关人员及时与本社联系。

图片资料提供单位及个人:山西博物院、宋建忠、何弩、李健民、高炜、王益人、赵静芳、薛新明、冀建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龙现中国: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 / 宋建忠著.—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6

(回望山西)

ISBN 7-203-05574-4

I.龙... II.宋... III.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襄汾县 IV.K8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5772 号

龙现中国

陶寺考古与华夏文明之根

著 者:宋建忠

责任编辑:郝文霞

封面设计:崔元和 田 玫

内文设计:点 面

英文编辑:赵 玉

责任印制:董建设

责任发行:赵并林

出 版 者: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030012

电 话:0351-4922268(发行中心)

0351-4922065(工作室)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承 印 者: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新华印刷分公司

开 本:1010mm×760mm 1/16

印 张:8.25

印 数:1-5000 册

版 次:200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E-mail:Fzxx@sxskcb.com(发行中心)

Web@sxskcb.com(信息室)

网 址:www.sxskcb.com

定 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山西建设文化强省文库》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申维辰

编委会副主任：申存良 董晓阳

编委会执行副主任：张明旺 卢 渝 崔元和

编委会委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葆柯 王灵善 申维辰

申存良 卢 渝 田奇越

杜学文 李广浩 张明旺

张彦彬 张继红 陈玉龙

荆作栋 崔元和 梁宝印

董晓阳 逯哲峰

《回望山西》丛书工作室

总 监：卢 渝 韩石山 崔元和

副总监：荆作栋 王灵善

成 员：石凌虚 孙 茜 张雪琴

杨 文 武 静 柏学玲

赵 玉 郝文霞 董志敏





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的发现，
使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山西南部重要遗址分布图

引言



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

公元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国际上通称 Republic of China，简称 China（“中国”）。自此，作为国名的“中国”一词具有了近代国家的真正含义。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一词的概念得以逐步完善、充实，与今天的含义基本一致。

作为国名的“中国”使用虽然不足百年，但“中国”一词的出现却至少要追溯到 3000 年前左右。公元 1963 年，陕

西宝鸡出土了一件距今约 3000 年的西周成王时期的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余其宅兹中或”等字样。据考古专家和古文字学家考证，“中或”就是“中国”。我国古代“国”字作“域”或“邦”解。“中国”就是“中央之域”或“中央之邦”之意。这应该是“中国”一词在文字记载中出现的最早实例和实际含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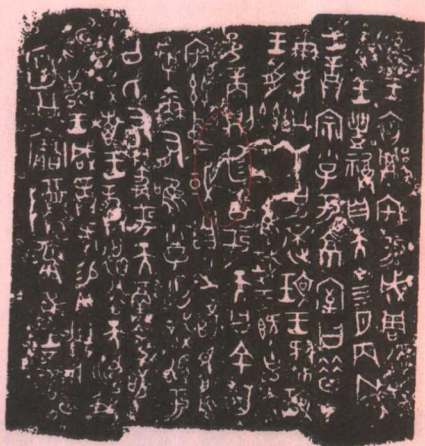
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献中，“中国”一词除了具有以上本义之外，又演变出数种不同的含义，大致说来主要有三种：一是专指帝王所在的国都和其直接统治的国家。如《诗经·大雅·民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二是指中原地区。如《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三是指古代华夏民族居住的地区或建立的国家。如《论语集解》：“诸夏，中国也。”实际上，即使这三种含义，其内在的联系也是非常紧密的，它们都是古代华夏民族对自己的帝王或者自己民族居住地的自称，代表了华夏民族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是相对于四周蛮、夷、戎、狄等少数民族而言的一种颇具优越性的孤芳自赏。这种认识尤其体现在先秦诸子百家对尧舜时期“中国”的津津乐道上。那么，让这些先秦时代的伟大的思想家们魂牵梦萦的尧舜时期的“中国”究竟在什么地方？她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兴衰过程？这是数千年来未解之谜。然而，令这

些先秦哲人始料不及的是 2000 多年后的今天，这段尘封的历史竟然得以再现，这个消逝的“中国”竟然得以再生。

1978 年，为了探寻夏人的足迹，来自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们对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开始了长达 6 年的发掘。发掘小组不断传出惊人的喜讯，一件件稀世瑰宝源源不断地从一座座大墓中露出，考古队为之沸腾了，学术界为之震惊了。如此规格之大墓，如此罕见之重器，充分说明墓葬的主人不是寻常之辈，而掩埋他们的这块土地自然也不是平常之地了。经过学者们的研究、探索，他们发现这些重要的遗存虽然不是他们踏破铁鞋所要寻找的夏人的足迹，但很可能是比夏人更早的五帝之一——唐尧的文化遗存。如此，陶寺遗址就该是唐尧的都城——“中国”了。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看过陶寺遗址的发现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大致在距今 4500 年左右，最先进的历史舞台转移到晋西南。在中原、北方、河套地区文化与东方、东南方国文化的交汇撞击下，晋西南兴起了陶寺文化，它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当历史的车轮在现代文明的推动下滚滚驶入 21 世纪时，我们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养育炎黄子孙的这片黄土地。

2002 年，国家重点攻关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正式启动，陶寺



何尊上的铭文

遗址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在随后的两年中，课题组对陶寺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钻探与重要遗迹的发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以及相匹配的贵族大墓。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城址的面积达到了 280 万平方米，相当于 4 个紫禁城的面积，成为目前我国发现的最大的史前城址。此外，与观天象和祭祀有关的大型圆体夯土建筑的发现，更是使陶寺遗址的重要性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其成为目前最重要的史前建筑。这些高规格的宫殿以及与天文历法和宗教有关的建筑设施的发现，以确凿的事实进一步说明了陶寺遗址作为“唐尧帝都”的可能。

现在，让我们走进山西，走进晋南这块孕育了华夏文明的神奇土地，透过那绵延亘古的层层迷雾，去触摸一个个历史的瞬间，感受远古文化的斑斓色彩，解析陶寺遗址的来龙去脉，诠释最早“中国”的兴衰。

目录

CONTENTS

CONTENTS

探寻远古的踪迹

黄河岸边的远祖 /002

汾水之畔丁村人 /005

壶口儿女 /013

玫瑰部族的扩张 /018

陶寺王国的再现

陶寺王国的发现之旅 /026

中国史前第一城 /031

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 /037

显赫的史前王陵 /043

华夏中国龙 /047

陶寺王国的瑰宝

铿锵的鼓乐 /054

会唱歌的石头 /056

古老的铃、埙 /059





神秘的瑞玉 /060

典雅的漆木器 /065

陶寺王国的生活

民以食为天 /070

多样的生活用具 /073

亘古不变的水井 /077

生态节能型住房 /080

陶寺王国的秩序

疆域和人口 /086

社会的分层 /089

资源的控制 /091

礼乐制度之滥觞 /095

永远的陶寺

王国的兴起 /100

王国的消亡 /102

珍贵的文字 /106

唐尧与陶寺 /111

华夏文明之根 /118





山西垣曲东关遗址出土的陶壶

探寻远古的踪迹

Exploring Traces of Remote Antiqu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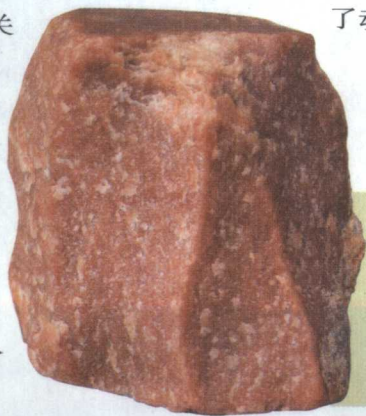
崛起于4500年前神秘而又灿烂的陶寺文化既非天外来客所为，亦非自身一跃而就。这颗枝繁叶茂的文明大树深深地植根于山西南部这块肥沃的土壤中，生存于黄土地上的黄河儿女用母亲河无私地灌溉着这颗参天大树，描绘出一幅幅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画卷。从180万年前的西侯度到10万年前的丁村，从2万年前的柿子滩到7000年前的奉国，再从6000年前的西阴到4000多年前的陶寺，这是一段何其艰辛而又漫长的旅途！从中折射出华夏民族怎样的心路历程？

黄河岸边的远祖

从美丽、圣洁而又神秘的青藏高原冲泻而下，黄河在苍劲的黄土高原上蚀刻出一个苍劲有力的“几”字。“几”字的最后一个拐弯，将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一笔分开，形成了一个“鸡鸣听三省”的特殊地区——风陵渡。相传这里曾是黄帝的贤相风后与蚩尤作战的地方，风后被蚩尤杀死后，黄帝将其葬于此地，谓之风陵。由此，渡口称做风陵渡。尽管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带有几许悲壮和感伤色彩的传说，但仍然注定了这样一个与中华始祖黄帝相关的地方必然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20世纪的考古发现果然证明，这个不同寻常的地方的确有着令人震惊的悠久

历史，她不仅展现了黄河之滨远古人类的生存印迹，而且重新书写了中华民族远古人类的历史。

1957年，为了配合三门峡水库的建设，保护和抢救地下埋藏的远古人类文化遗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王择义、翟人杰、黄万波等学者组成了三门峡水库库区考古工作队，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对相关地区的考古调查。1959年，工作队在调查中进行至风陵渡以北约10千米处时，他们走到了一个叫西侯度的小村子。当他们来到村后被当地农民称做“人疙瘩”的地方时，调查人员在断崖交错的沙砾层中惊喜地发现了动物化石。次年，他们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几件具有人工打制痕迹的石块。为了进一步搜寻这些重要的遗存，



西侯度出土的石核。在人们的心目中，石头也许是最经得起岁月变迁和风吹雨打的。即便如此，你是否会想到，这是一件距今180万年的石器？

西侯度出土的刮削器。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当时的石制品主要由石英岩制成。



1961~1962年,由山西省年轻的考古学者王建主持,对这一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掘引起了北京专家和领导的高度重视,1961年11月上旬,裴文中、贾兰坡等权威专家和国家文物局前局长王冶秋先后考察了西侯度遗址。王冶秋惊叹于晋南拥有如此久远的文化遗存,遂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晋南好戏不寻常,
史迹绵延万古长。
猿人更有猿人早,
哪论唐虞与汉唐。

西侯度的两次发掘不仅出土了一批古脊椎动物化石、32件石制品、带有切割和刮削痕迹的鹿角,还获得了一些烧过的哺乳动物的肋骨、鹿角、马牙等。其中能鉴定的哺乳动物化石全部为绝灭种,据此推测地层所处的年代为早更新世,古地磁测定的

年代约距今180万年,是当今国内已知的最古老的一处旧石器时代遗址。

遗址中与石制品

同层出土的除鲤、鳖和鸵

鸟等动物化石外,还有22种哺

乳动物种属化石。动物群中绝大部分为草原动物,如鸵鸟、鬣狗、长鼻三趾马、三门马、披毛犀、板齿犀、布氏真枝角鹿、轴鹿、四不像鹿、布氏羚羊等;也有适合丛林生活的李氏野猪、中国古野牛、粗壮丽牛、剑齿象、平额象等。由此类动物群的组合和动物的生态习性可知,当时的西侯度一带属疏林草原环境,周围应有较宽阔的水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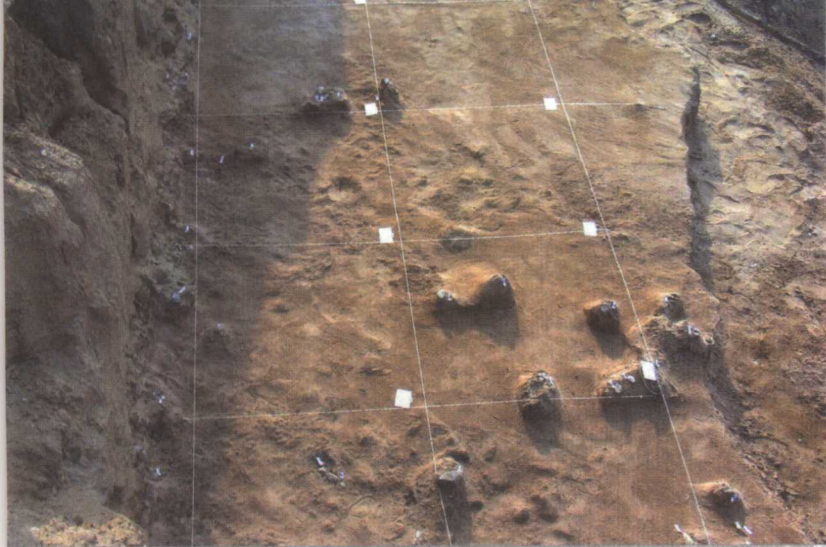
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适宜大量动物在此生存,同时也哺育了远古的人类,遗址中出土的32件石制品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学者们研究后认

西侯度遗址地貌。据出土于这里的动物化石推测,180万年前这里为疏林草原环境,周围有较宽阔的水域。



回望山西
探寻远古的踪迹





10件砍砸器中,研究者将其分为单边和多边两种,其中的一件多边砍砸器以大型石片为毛坯,周边有4个刃口,两面交互加工。刮削器共有6件,可分为直刃、凹刃和圆刃3种。三棱大尖状器仅发现1件,器表大部分保留了砾石面,只是在尖端加以修整,

为,石制品主要用石英岩制成,类型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和三棱大尖状器。最大的一件石核重达8.3千克,最小的仅为33克,说明当时的人类不仅使用大型石器,而且也开始以小石片等作为工具。分析石核和石片上的人工痕迹,可以发现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直接打击技术的三种方式:锤击法、砸击法和碰砧法。经济形态和生活方式决定了早期人类所使用的工具形态,砍砸器无疑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一种主要工具。在发现的

这件石器开启了我国大三棱尖状器的先河,从此这类石器成为中国旧石器时代一种极具代表性的工具,一直传承下来,迤邐绵延达百万年之久。

与石制品同层发现的还有两件带有“V”形断面沟槽,可以肯定是用锐利的器物人工切割或砍斫而成;另一件上面则有清楚的刮痕,有学者据此推测当时的人类可能已经开始制作骨器。

除了以上发现的这些重要的人



“北京人”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位于北京西南48千米处,以出土了6件较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而闻名于世。科学家们把这种原始人类定名为“北京人”,将其居住的洞穴称为“北京人遗址”。“北京人”的发现,是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

工打制石器外，西侯度遗址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无疑要算人类用火的遗迹了。在清理文化层中的动物化石时，发掘者发现了一些黑色、灰色和灰绿色的骨骼，它们是马牙、鹿角和哺乳动物的肋骨。这些不同于正常颜色的动物化石让发掘者感到一丝意外和惊喜，因为这些黑色和灰色的骨骼很有可能被火烧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灰绿色的马牙上还有因炸裂而形成的碎纹，和“北京人”遗址中被烧过的骨头和牙齿没有什么分别，也许这是西侯度人用火烧烤猎物的证据。后来实验室的化验分析终于证实了人们推断的正确。

20世纪20年代，令世人震惊和兴奋的周口店“北京人”遗址轰动性的发现，以其丰富的材料解决了爪哇猿人化石悬而未决的争议，确立了达尔

丁村遗址地貌



文学派从猿到人进化的理论。因此，“北京人”的发现，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是20世纪古人类学界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将人类演化的历史上溯到了50多万年前。西侯度遗址虽然没有人类化石的发现，但与人类活动相关的石制品和用火遗迹的发现，无疑将人类起源的时间追溯到了180万年前。

汾水之畔丁村人

从风陵渡经运城北上至襄汾县的丁村，距离不足200千米，今天行驶于高速公路上仅为2个小时的路程。然而，我们的祖先从西侯度步履蹒跚地走到丁村却用了将近170万年。这是何等艰难的一次行走，其间经过了怎样的斗转星移和沧海桑田，今人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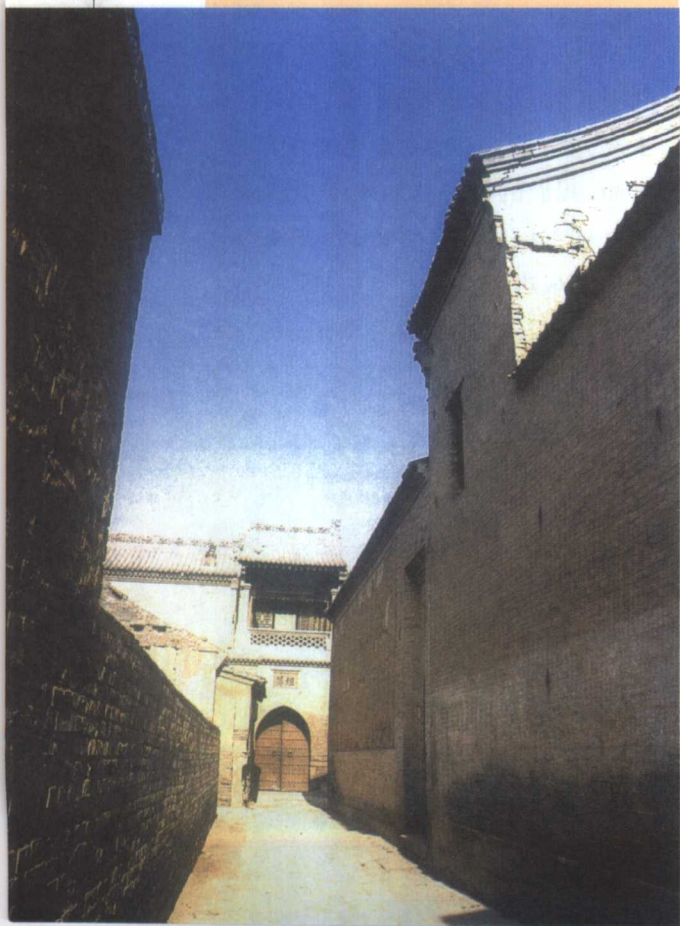


论如何是想象不出来的。

丁村,一个与周口店一样声名远播的地方。由于出土了代表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丁村人”人类化石,故而同“北京人”一道被写入中国的教科书。

丁村遗址由多个地点组成,分布在襄汾县城至柴庄长达11千米的汾河两岸的二级台地上。今天的丁村除了拥有十分久远的丁村遗址外,还拥有一组明清时期的民居。这两处在时间上相隔十几万年的文化遗产,携手

丁村民居的院落通道



成为丁村两项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一个小小的村子同时拥有两项珍贵的文化遗产,不仅在山西,即



“丁村人”牙齿化石

使在全国也是极其罕见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闻名于世、承载了太多文化和传统的小村子,在50年前却不为人所知。

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中国的建设热火朝天,建筑用砂数量猛增。汾河之畔的丁村人几乎全部加入了采砂的队伍。1953年的5月间,采砂的人们不时地为一些意外的发现所困惑,他们不太明白沙砾中为什么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牙齿、骨骼以及黑色的石块。工地负责人郑怀礼将工地发生的异常情况逐级上报襄汾县文教局、临汾行署文教局、山西省文管会和山西省文教厅。省文管会在接到报告后的第一时间,就迅速派出了有“化石猎手”之称的王择义先生前往丁村。短短几天,他就采集到了一批珍贵的哺乳动物化石和石制品,随后带回太原。这一发现旋即传到北京,立刻引起了考古学家裴文中、贾兰坡和古生物学家周明镇等人的极大关注。经过观测,专家们一致认